

民国时期羊楼洞茶区的茶业经营及物价问题研究 ——以沙坪永玉茶号商业账簿为中心(1924—1929)

方超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近代以来,羊楼洞制茶工业的勃兴对鄂南乡村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物价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乡村工业化进程中该地区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而囿于文献资料挖掘不足,目前学术界对于民国时期鄂南乡村地区物价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沙坪永玉茶号”商业账簿作为店号日常经营的收支记录,集中反映了鄂南羊楼洞茶区的茶业经营及物价状况。在茶业经营方面,该地区的茶叶贸易对国外市场具有较强的依附性,使得经营过程存在较大的价格风险。在物价方面,由于受到货币贬值、自然灾害与战争等因素作用,该地区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物价上涨促使生活成本提高,并对制茶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造成影响。

【关键词】民国时期;羊楼洞茶区;商业账簿;物价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2)05-0078-12

Research on Tea Business and Price Issues in Yangloudong Tea Area during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Centered on the Business Account Books of the Yongyu Tea Firm in Shaping (1924-1929)

FANG Chao

(School of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Abstract: In modern times, the flourishing of the tea industry in Yangloudong greatly impacted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in rural areas of southern Hubei province. A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ices can more comprehensively reflect the operation of the region's macroeconomy in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literature and data mining, the curr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price problem in the rural areas of southern Hubei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relatively lacking. As a record of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for the store's daily operation, the commercial account books of "Yongyu tea firm in Shaping" centrally reflects the tea industry operation and price situation in the Yangloudong tea area in southern Hubei. In terms of the tea business, the region's tea trade strongly depends on foreign markets, making the business process have a greater price risk. In terms of prices, due to currency devaluation, natural disasters, and wars, there was severe inflation in the region, and rising prices contributed to higher living costs and affected the actual wage levels of tea workers.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Yangloudong tea area; business account books; price

物价史作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论著较多,尤以清代粮价研究最为显著。而囿于文献

[收稿日期] 2021-05-1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清代以来中原腹地人地关系视野下农业技术经济转变研究”(18BZS138)

[作者简介] 方超(1993-),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史与民间文献。

资料等原因,目前学术界的物价史研究在专题、时间段与区域上均存在冷热不均的态势^①。专题多关注粮价,时间段多集中于清代,区域则偏重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区,对于民国时期鄂南地区特别是乡村物价问题的研究相对不足。近代以来,制茶工业的勃兴对鄂南乡村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区域经济的整体性发展推动了茶叶产销的近代化尝试^②。物价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乡村工业化进程中该地区的经济运行状况。因此,加强鄂南乡村地区的物价史研究,不仅有助于平衡当前研究中区域分布不均的问题,更有助于跳出以经济中心代表区域平均水平的思维窠臼,从内部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

经济数据是开展物价史研究的基础。近代中国反映农民消费支出情况的系统性资料较为缺乏。除报纸和地方志外,可资借鉴的主要有: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卜凯对1929—1933年中国22个省、168个地区、16786个农场和38256户农家的调查^③;1932—1939年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13省59个乡村的调查数据^④;1927—1952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搜集编制的“南开价格指数”^⑤。但上述各项研究普遍存在覆盖面较窄、统计口径与方法不一等问题。因此,拓展史料成为开展鄂南乡村地区物价研究的基础工作。账簿,是伴随民众经济行为而产生的文书材料,其中涉及大量物价、工资及货币兑换等社会经济信息。早在民国时期,学者甘博、孟天培等人就利用账簿对北京及周边地区农民的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⑥。20世纪50年代,著名学者严中平对账簿数据的整理工作受到学界的肯定,但随后此类史料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⑦。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史理论视角与方法的转变,物价史研究对于账簿史料的关注和运用逐渐开始热衷起来。

羊楼洞,位于今湖北省东南部湘鄂交界处,明清时期属武昌府蒲圻县,民国时期属湖北第一行政督察区^⑧。其境内山峦叠嶂、气候湿润、雨水充足,宜于茶树栽培,故产茶颇多。近代以羊楼洞为加工集散中心的广大茶区被称为“羊楼洞茶区”,包括“鄂南之蒲圻、崇阳、咸宁、通城、通山、嘉鱼,湘北之临湘、平江,赣西北之修水等9县产茶区域,其中前7县为茶区主体”^⑨。本文研究的永玉茶号是1924—1929年间经营于湖北省崇阳县沙坪镇、湖南省临湘市聂市镇的晋帮商号,其商业文书现收录于刘建民先生主编的《晋商史料集成》^⑩,详细情况如下:

账簿8册:1924年《市山草结宝账》《汉口会项宝账》《玉记市山存傢据账》《玉记坪山老茶总结账》;1925年《玉记坪山红茶草结账》;1926年《玉记坪山红茶草结账》;1928年《玉记老茶草结宝账》;1929年《玉记坪山老茶总结草账》。

票据6张:1925年《玉记办红茶花底》4张;1928年杨达初、陈金轩所立定条2张。

总体而言,永玉茶号的相关账簿、票据材料保存较为完整。虽然记录时间短,但由于商业经营的特殊性质,其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为民国时期羊楼洞茶区的物价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此外,

① 王蕾:《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物价史研究述评》,《兰州商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② 定光平:《羊楼洞茶区近代乡村工业化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13页。

③ [美]卜凯:《中国土地利用统计资料》,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④ 郑成林:《民国时期经济调查资料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年,第28册,第55—332页。

⑤ 孔敏:《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⑥ [美]甘博、孟天培著:《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工资及生活程度》,李景汉译,北京大学出版部,1926年。

⑦ 袁为鹏、马德斌:《商业账簿与经济史研究——以统泰升号商业账簿为中心(1798—185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⑧ “羊楼洞”在1926年以前属鄂东道管辖,此后至1932年由省直辖,1932年以后属湖北第一行政督察区。

⑨ 定光平:《羊楼洞茶区近代乡村工业化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第12页。

⑩ 刘建民:《晋商史料集成》,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0册,第677—973页;第60册,第579—584页;第65册,第680—681页。

出于对数据完备性和连续性的考虑,本文仅以沙坪永玉茶号商业账簿为中心,对其所反映出的茶业经营及物价问题进行集中论述。

一、沙坪永玉茶号及其经营

(一)茶号基本信息

在正式开始账簿数据的统计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其记录主体——“沙坪永玉茶号”的基本信息作简要考证(以下简称“沙坪茶号”)。本节主要依据账簿与票据材料,对茶号的概况进行探讨,主要涉及茶号地点、经营时间、各号间关系三方面内容。

1. 茶号地点。根据账簿所示,茶号的经营地点在“坪山”,即位于今湖北省崇阳县西南部的“沙坪镇”,旧称“大沙坪”。另一处“市山”茶号位于今湖南省临湘市北部的“聂市镇”,旧称“聂家市”。两地均属于典型的茶叶种植区,据同治《崇阳县志》所载:“今四山俱种,山民藉以为业。往年茶皆山西商客买于蒲邑之羊楼洞,延及邑西沙坪。”^①在1924年账簿中记录有“坪号来往”^②,且5册账簿均提到“崇邑”及“沙坪商会”等信息。此外,在1928年陈金轩所立定条中记录收付方为“沙坪永玉茶庄”^③,足见该茶号的经营地点就在沙坪镇。

2. 经营时间。由账簿封面可知,沙坪茶号的经营时间为1924—1929年,仅缺少1927年的记录。然而,在1924年账簿中记录有:“收结存估平足银二千四百二十二两六钱三分”^④,意为旧账划来的上年余款。且1929年账簿中还有“如数卜收十九年账”的记录^⑤。因此,茶号经营时间的上限应推至1923年,下限应推至1930年。但本文为便于数据的统计分析,仍采用1924—1929年的经营时间。

3. 各号间关系。沙坪茶号并非独立的个体,而是整个“永玉商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营体系以山西总号为核心,以汉口分号为中转枢纽,协调统筹其余各茶号,从而实现收购——加工——发售“三位一体”的茶叶产销格局。具体可依据“产区初级市场”“周转中级市场”与“茶叶承销市场”的标准分为三个层级(图1)^⑥。

首先,是以沙坪、聂市两处茶号为代表的产区小号。根据定光平的研究,鄂南地区各茶号“多属晋商在汉口所设分号或办事处下的小号或出庄,负责茶叶的收购和加工”^⑦,沙坪茶号与分驻聂市镇的茶号便属此类。

其次,是以汉口茶号为代表的周转分号,账簿中记为“汉号”。沙坪、聂市两处小号均需接受汉口分号的管理,后者主要负责接待山西总号派出的办茶人员,在产区的茶叶采办过程中提供资金支持,并且小号制成的货物要集中运往汉口发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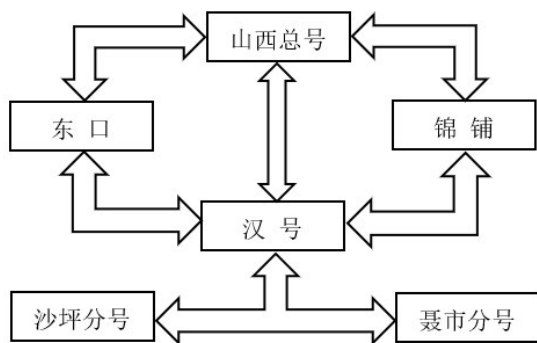


图1 永玉商号层级体系示意图

① 同治《崇阳县志》卷4《食货志·物产》,江苏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73页。

② 刘建民:《晋商史料集成》第40册,第781页。

③ 刘建民:《晋商史料集成》第65册,第681页。

④ 刘建民:《晋商史料集成》第40册,第745页。

⑤ 刘建民:《晋商史料集成》第40册,第931页。

⑥ 根据陶德臣的研究,近代中国茶叶市场结构可分为:散布产区的广大初级市场、以茶埠为中心的周转中级市场以及海外茶叶承销市场。详情可参见:陶德臣:《近代中国茶叶市场结构与功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⑦ 定光平:《羊楼洞茶区近代乡村工业化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第38页。

最后,是以张家口、凌海两处茶号为代表的承销分号,账簿中记为“东口”与“锦铺”。在小号制成的货物汇总汉口后,分别发往“东口”与“锦铺”两处进行销售。“东口”即河北张家口,是北路茶叶贩运的重要商镇。近代以来,晋商主要通过张家口与杀虎口将茶叶运往库伦、归化与恰克图等地与蒙、俄商人进行贸易。永玉商号在张家口设立分号,便于发挥其陆地商埠的天然优势,从而实现茶叶销售工作的高效率运转。锦铺的经营地点,根据1928年的支出记录:“出李仪由锦经津至汉火车、轮船脚资路用大洋五十七元,作估平银四十两五九。”^①可据此推断应位于北方地区。再者,1924年账簿中还记录有:“净取锦平银三千三百九十三两一一,计估平三千四百五十一两八。”^②这里的“锦平银”是辽宁凌海地区经常使用的平砵^③。且由凌海可搭乘京奉铁路转京汉铁路至汉口^④,与上文所述路线相符,可知“锦铺”应是负责凌海地区茶叶销售任务的派出机构。此外,两处茶号也会向汉号提供部分资金和人员的帮助。

(二)茶号的经营状况

以下主要通过对沙坪茶号商业账簿内容的分析,从经营品种和经营业绩两方面对其经营状况进行考察。

1.经营品种。沙坪茶号经营的茶叶品种主要包括老茶与红茶两类。“老茶”即老青茶,又称黑茶,是压制茶砖的原料,在“鄂南蒲圻、崇阳、通城、通山、咸宁等县以及湘北之临湘,均有出产。其主要集中地,计有羊楼洞、羊楼司、聂家市及柏墩四处。”^⑤两湖红茶向为出口大宗,其出产区域“以湖南之安化、桃园、长寿街、平江、蓝田、高桥、永丰、聂家市、醴陵、浏阳、湘潭、云溪,湖北之宜昌、羊楼洞、羊楼司、崇阳、通山、大沙坪等处最为著名。”^⑥

再者,沙坪茶号还经营米茶、花香与茶梗等类。“米茶”是以红茶为原料精制而成的品种,因似米形而得名。又因制作均系人工,故也称“工夫茶”,多由英商收购。“花香”即红茶末,与茶梗均系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余料。因俄商选茶偏重色味,故兼收花香和茶梗,主要用于压制花香砖或红茶砖。

2.经营业绩。前文已述,沙坪茶号作为产区小号,主要承担茶叶的收购与加工任务。因此,其经营业绩主要体现在茶叶收购量与制货量的年际变化。在茶号账簿中,详细记录有沙坪茶号在1924—1929年间的茶叶采办情况,其具体状况如表1所示。

表 1		沙坪永玉茶号 1924—1929 年间茶叶采办情况表	
年份	品种	收购量(斤)	制货量
1924	老茶	83848	5912 箱
1924	红茶	1243.5	23 箱
1925	红茶	35715.62	812 箱 41 包 35 篓
1926	红茶	30577	688 箱 33 包 9 篓
1928	老茶	70279	5458 箱
1929	老茶	87458	7340 箱

资料来源:根据1924—1929年沙坪永玉茶号办茶账簿中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说明:1.1924年所收红茶系老茶附属购买,与1925—1926年的红茶量不具备可比性;2.制货量以“箱”计,红茶中花香、茶梗等分别以“包”“篓”计。

根据表1可知,沙坪茶号在1928年以前的经营业绩呈下滑趋势。收茶量方面,由于老茶与红茶分别

① 刘建民:《晋商史料集成》第40册,第891页。
② 刘建民:《晋商史料集成》第40册,第781页。
③ 戴建兵:《中国近代银两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68页。
④ 曾鲲化:《中国铁路史》,燕京印书局,1924年,第678—680页、第743—745页。
⑤ 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36年,第1页。
⑥ 《汉口之红茶贸易》,《经济半月刊》1927年第1卷第2期。

减少约16%与14%。从而影响制货量分别减少约8%与18%。这与近代以来茶业经济发展的颓势是相符合的。民国初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华茶外销量锐减,且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输俄砖茶量也因之减少。“1920年全国茶叶出口仅305906担,比1915年减少1476447担,相当于1912年的出口量。”^①据调查,1925年湖北各地茶庄运销汉口的红茶共353100箱,而至1927年已降至246160箱,前后减少约30%^②。

沙坪茶号在1928年以后的经营业绩实现增长。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苏俄国内政治局势逐渐稳定,中俄茶叶贸易遂开始恢复。“及至民国十六年以后,苏俄复增加砖茶之数量,颇有恢复大战以前之盛况,当时俄商协助会在汉口采办砖茶数量达三四十万担之多。同时两湖之红绿茶及花香等,运俄者,为数亦不在少。”^③1929年沙坪茶号共收购老茶87458斤并制货7340箱,已较1928年分别增长约24%与34%。

二、货币及生活用品价格

(一)货币行用

1. 银钱、银洋比价。沙坪茶号商业账簿中的记账货币可依据材料与形制的区别分为:银两、大洋与制钱。“银两”形制以银锭为主,是以两、钱、分、厘、毫为计量单位的称重货币。“大洋”即银元,以元、角、分为货币单位。民国三年(1914),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规定银元为法定货币,1元约合库平纯银6钱4分8厘,重新实行银本位制。此外需要说明的是,账簿中的“制钱”虽以“文”为货币单位,但实际是指代铜元。“铜元”又称铜币,圆形无孔,是近代银钱并行制度末期发行的一种名义货币。首铸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政府继续沿用。面值分为“当二十文”“当五十文”“当一百文”等多种类别,使用方式与旧时制钱相同,是传统货币体制与近代货币体制相互碰撞、融合的产物。现结合账簿内容,从银钱、银洋比价两方面探讨沙坪地区的货币兑换情况,具体内容见表2。

表2 沙坪地区1924—1929年银钱、银洋比价表

年份	银钱比价(两/文)	银洋比价(两/元)
1924	0.0003	0.69
1925	0.00025	0.69
1926	0.000242	0.68
1928	0.000175	0.695
1929	0.000164	0.689

资料来源:根据1924—1929年沙坪永玉茶号办茶账簿中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说明:1.表中银两以估平银为兑换单位;2.为便于数据分析,铜元面值仍以制钱计算。

通过表2对比可知,1924—1929年沙坪地区铜元兑换银两的价格呈逐年降低的趋势,累计下跌约45%。而大洋的价格则相对平稳,至1929年仅累计下跌约0.14%。

造成上述变化的原因:首先,世界银价下跌导致铜元贬值。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世界各国逐渐开始实现金本位制或信用本位制。其结果导致世界白银供给过量,伦敦标准银价在1924—1929年间下降约31%^④。由于铜元的价格是以白银与铜的比价衡量的,且铜的价值量本就低于白银,因此银价下跌直接影响到铜元的兑换价格。其次,私自滥铸导致铜元数量供过于求。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各省厂

① 陶德臣:《民国茶业的衰败破产及其原因》,《近代中国》2010年第20辑。

② 《汉口茶业之调查》,《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1卷第15期。

③ 戴啸洲:《汉口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1934年第6卷第6期。

④ 戴建兵:《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226页。

局均开铸铜元,将其作为筹措军饷的主要方式。到南京国民政府法币改革前,国内铜元铸造量已达800多亿枚,较清末200亿枚的铸造量超出3倍有余。不仅如此,铜元质量也逐渐败坏,含铜量从起初的95%降至80%甚或60%^①。而相较于铜元,大洋的价值量与官方规定的白银重量挂钩,具备无限法偿能力,因此兑换价格相对平稳。

2. 虚银两及其兑换价格。“虚银两”是相对于“实银两”而言的,两者均是银两的存在形式。“商品标价、国家财政收支、民间债权债务契约上的银两数字均是虚银两,而实际发挥货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职能的是实银两。”^②账簿中所涉及的虚银两主要有:库平银、估平银、洋例银、参平银、元银以及锦平银。

“库平银”是由官方规定且主要用作征收厘税的权衡标准。“估平银”与“洋例银”通行于汉口。前者是公估局制定的平砵,本地或外来银两若不符合其成色要求,不经改铸就无法流通。因此,估平银在账簿中成为其它银两的结算货币。“洋例银”或称“洋例纹”,是汉口华商仿照上海“九八规元”创设的虚银两,常用于外国杂货、棉布、茶叶及轮船航运等贸易。“参平银”与“元银”在账簿中用于茶叶的购买,但具体含义尚待查考^③。此外的“锦平银”是凌海地区普遍使用的平砵。上述各类虚银两之间均存在明确的兑换关系,其价格如表3所示。

表3 1924—1929年各虚银两兑换汉口估平银价格表 (单位:两)

年份	库平银	洋例银	参平银	元银	锦平银
1924	1.052	0.98	1.006	0.77	1.017
1925	1.052	0.98	—	—	—
1926	1.052	0.98	—	—	—
1928	—	0.98	1.006	0.77	—
1929	—	0.98	1.006	0.77	—

资料来源:根据1924—1929年沙坪永玉茶号办茶账簿中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说明:元银需先折算为参平银再兑换估平银($0.815 \times 0.94 \times 1.006$)

由表3可知,1924—1929年间各类虚银两的兑换价格均保持长期稳定。而由于地区铸造标准的不同,其相互之间的兑换价格也存在差距。总体而言,“库平银”因是官方规定的平砵,所以兑换价格最高。其次为“锦平银”与“参平银”。“洋例银”则以上海“九八规元”兑换价格为准。“元银”的价格最低且需先折算为“参平银”,而不能直接兑换汉口估平银。

(二)生活用品价格

茶号账簿中可计算单价的生活用品主要包括:麻油、精盐、酱油、大米、洋面、猪肉、汾酒、丝烟8种。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这里选取麻油、大米、洋面、猪肉、汾酒5种商品构建“市场篮子”。并选择1924年为基期,计算出沙坪地区在1924—1929年间逐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同时,以王玉茹编制的“近代中国农村物价指数”为参照,对本地区的物价水平进行考察。详见表4和图2。

表4 沙坪地区1924—1929年生活用品价格表 (单位:两/斤)

生活用品	1924	1925	1926	1928	1929
麻油	0.137	0.157	0.142	0.156	0.142
精盐	—	0.054	0.068	—	—
酱油	—	—	0.082	0.070	—

① 梁辰:《铜元问题研究(1900—1935)》,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7页。

② 戴建兵:《中国近代银两史》,第50页。

③ 《山西票号史料》中提及汉口地区有通行“汉参平”,但对具体含义未做说明。详情可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财经学院:《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1990年,第698页。

续表4

大米	0.029	0.039	0.069	0.028	0.042
洋面	0.041	0.045	0.049	0.050	0.051
猪肉	0.131	0.110	0.196	0.160	0.159
汾酒	0.135	0.137	0.162	0.167	0.179
丝烟	—	0.240	0.232	—	—

资料来源:根据1924—1929年沙坪永玉茶号办茶账簿中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说明:1.表中数据为该商品在当年的平均价格,依据账簿中该商品的购买量与总价计算得出。2.表中数据以洋例银、大洋、铜元支付者,均已调整为估平银结算。3.洋面价格单位为“两/袋”,以50斤/袋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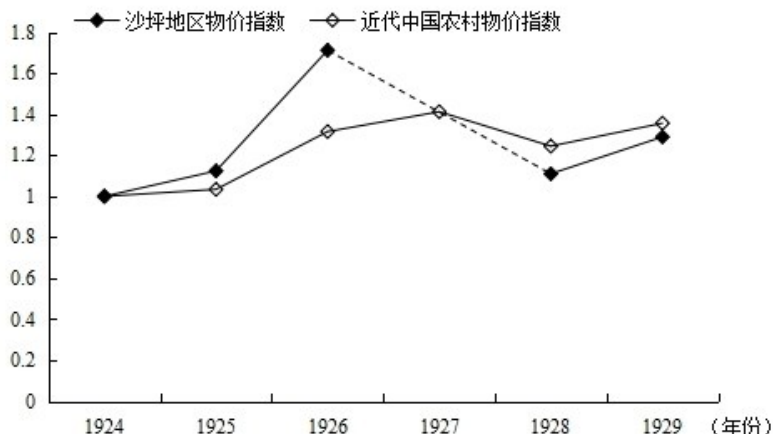


图2 1924—1929年沙坪地区与近代中国农村物价指数比较图(1924=1)

资料来源:1.“沙坪地区物价指数”根据1924—1929年沙坪永玉茶号办茶账簿中相关数据计算整理。2.“近代中国农村物价指数”引自王玉茹:《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第36—37页。

说明:“近代中国农村物价指数”以1930年为基期,图中已调整为1924年。

立足于表4和图2可知,沙坪地区6年间的物价指数以1926年为分水岭,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924—1926年呈迅速上涨趋势,至1926年达到历史峰值(1927年除外)。1926年以后呈下降趋势,1928—1929年物价指数再次升高。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沙坪地区的物价指数变动更为剧烈。但值得注意的是,王玉茹所编制的“近代中国农村物价指数”主要是依据张履鸾对江苏武进区物价问题的研究,以及1932—1939年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13省59个乡村的调查数据。同时,在计算物价的加权平均指数时选择以巫宝三对1933年各行业产值的估计数据为权重(本文以1924年商品购买量为权重)^①。因此,经济数据与统计方法的不同是影响二者波动差异的主要因素。但沙坪地区物价指数的增减趋势仍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相同。

沙坪地区在1924—1929年间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由图2可知,沙坪地区逐年的物价指数差额基本在31%以上,且保持高位运行。其主要原因与货币贬值显著相关。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湖北地方政府过度铸造铜元,使得大量劣质铜元充斥货币市场。再者,近代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较快,商品化程度明显提高。居民购买生活用品多依赖铜元,因此其流通速度是加快的。随着货币供应量与流通速度的不断增长,使得铜元价格在6年间贬值约45%,货币效率的降低直接导致通货膨胀的形成。

社会环境的变化促使1926年的物价指数达到历史峰值。湖北地区历来水、旱等灾害频繁,1924年

^① 王玉茹:《近代中国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34页。

水灾就覆盖黄梅、蒲圻、天门等11县^①，1926年旱灾又涉及全省64县^②。农业产值受到严重影响，物价由此昂贵。再者，1926年正值北伐战争的关键阶段，羊楼洞茶区地处湘鄂两省交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受战争的影响更为明显^③。1927年中共湖北省委领导的秋收起义在鄂南地区展开，遍及咸宁、蒲圻、嘉鱼、通城、崇阳、通山等县。且随着1928年湘鄂赣苏区的建立，三省交界地带的土地革命运动得到更大发展^④。地区间政治局势的变化，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存在较大影响。因此，1927—1928年物价指数短暂下降后，至1929年又重新升高。

三、生产资料价格及工资水平

(一)生产资料价格

1. 茶价。沙坪茶号主要收购老茶与红茶，两者可根据品质分为洒面、二面、里茶、头毛红、毛红、米茶、花香以及茶梗等类别。上述各种茶叶的收购价格参见表5。

表5	沙坪地区 1924—1929年茶叶收购价格表					(单位:两/斤)
茶叶品种	1924	1925	1926	1928	1929	
洒面	0.349	—	—	0.359	0.353	
二面	0.315	—	—	0.342	0.333	
里茶	0.269	—	—	0.302	0.281	
头毛红	0.185	0.190	0.227	—	—	
本号毛红	—	—	0.082	—	—	
本号茶梗	—	0.091	0.085	—	—	
花香	—	0.054	—	—	—	
米茶	—	0.188	0.230	—	—	

资料来源:根据1924—1929年沙坪永玉茶号办茶账簿中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说明:1. 相同茶叶品种的收购价格为最高价与最低价的简单算术平均。2. 表中数据以元银、铜元支付者,均以当年比价调整为估平银结算。

根据表5所示,老茶“洒面”价格最贵,“二面”价格居次但相差不多,“里茶”则价格最低。“洒面”与“二面”均属于“细茶”,前者在压制茶砖时用作表面,品质最好。后者用作茶砖底面,又称“洒底”,品质较次。“里茶”则属于“粗茶”,是茶砖中层的原料。但枝梗颇多,且叶片老硬,所以品质最劣。正因如此,三者在价格上也存在差距。

红茶“头毛红”和“米茶”的价格最贵。“头毛红”与“毛红”均是指未经加工的粗制红茶,但前者因采摘时间早,所以品质较好。“米茶”属于精制茶,价格与“头毛红”相当。此外的“花香”、“本号茶梗”及“本号毛红”均是由汉号发来的往年存货,并非购自于茶农,但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价格水平。

红茶的收购价格普遍低于老茶,这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有关。两湖地区产茶素来以青茶居多,而红茶的产量与市场占比较低,“在汉口茶市最盛时,鄂省红茶销数,亦仅十余万箱而已。”^⑤近代两湖红茶的产销多受英商操纵,至1890年后英商全力推销印锡红茶,本地红茶销量锐减。而以老茶为原料制成

① 《呈临时执政会核湖北省黄梅等县十三年分灾歉地亩恳请分别蠲缓银米文》,《财政月刊》1926年第13卷第149期。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1912—192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17页。
③ 曾宪林、曾成贵、江峡:《北伐战争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119页。
④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宜春地区史料征集办编写:《湘鄂赣苏区史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12页、第36—53页。
⑤ 《汉口茶业之调查》,《工商半月刊》1929年第1卷第15期。

的砖茶,却因俄国市场的需求,出口量激增。此外,红茶的初制工序繁复,“又需垫付成本,及制成毛茶后,更感无人收买及杀价之苦,不若老青茶制造简便,成本低廉,反较红茶为有利可图。”^①有鉴于此,茶农逐渐扩大老茶的生产规模。随着产区供给与市场需求的转变,导致红茶的收购价格低于老茶。

1928—1929年因市场供求关系影响,老茶收购价格降低。自1927年以后,中俄茶叶贸易逐渐恢复。据调查,1928年由汉口共输出砖茶数量402615担,较1927年增长约58%^②。对市场预期的看好,促使茶农继续扩大老茶的供给量。但1929年“中东路事件”以后,中俄关系又急剧恶化,致使当年汉口砖茶出口较1928年减少约13%^③。茶农的生产往往滞后于市场形势的变化,由此造成的供求关系失衡,导致茶叶收购价格下跌。

2. 制茶用品价格。茶叶收购完成后由茶号组织人力进行精制加工。在制成茶货前,还需经过筛分、烘焙、压制、包装等流程。账簿中常见的制茶用品主要包括:器具、工料、燃料及包装品等。表6以燃料与包装两类用品为例,具体展现了1924—1929年间沙坪地区制茶用品的价格情况。

表6 沙坪地区1924—1929年制茶用品价格表 (单位:两)

制茶用品	1924	1925	1926	1928	1929
烟煤(吨)	10.857	—	—	14.268	14.553
白煤(吨)	—	0.375 两/石	0.411 两/石	5.57	14.555
木炭(斤)	—	0.011	0.010	0.011	0.011
折表纸(块)	4.082	—	—	4.312	4.402
洒灰纸(篓)	4.775	—	—	3.920	4.321
毛边纸(篓)	7.857	7.835	5.720	7.252	7.252
花纸(箱)	0.022	0.023	0.026	0.022	0.022
白皮纸(块)	—	14.112	12.396	—	—
黑皮纸(块)	—	8.330	7.252	7.250	7.250
改连纸(块)	—	—	—	0.954	1.068
连洒纸(刀)	—	—	—	0.765	0.827
洋花纸(刀)	—	—	—	1.112	1.102
元黄纸(刀)	—	—	—	0.417	0.413
元录纸(刀)	—	—	—	0.417	0.413
斤箱壳(只)	0.224	—	—	0.254	0.254
东箱壳(只)	0.262	—	—	0.293	0.293
25箱壳(只)	0.216	0.226	0.206	—	—
大箱壳(只)	0.266	0.321	0.290	0.264	0.264
套箱壳(只)	—	0.075	0.075	—	—
铝(斤)	—	0.144	0.131	—	—
篾叶(只)	0.067	—	—	0.069	0.077
竹篾(石)	1.387 两/捆	—	—	1.387	1.387
棕绳(条)	—	0.020	0.022	—	—
草绳(条)	—	0.008	0.007	—	—

资料来源:根据1924—1929年沙坪永玉茶号办茶账簿中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说明:1.表中数据为该商品在当年的平均价格,依据账簿中该商品的购买量与总价计算得出。2.表中数据以大洋、铜元结算者,均以当年比价调整为估平银结算。3.制茶用品的计量单位以括号内所示为准,不同单位

① 陈国汉:《羊楼洞砖茶之制造与运销》,《贸易半月刊》1939年第1卷第4期。

② 戴啸洲:《汉口之茶业》,《国际贸易导报》1934年第6卷第6期。

③ 同上。

数据已在表中列出。

由于茶叶加工完成后需先用纸包装,然后放入篾箱或竹篓。因此,表6中所示的各类制茶用品中,以包装品特别是纸、箱壳的种类最为丰富。同单位纸以白皮纸、黑皮纸、毛边纸等价格最贵。箱壳以大箱壳、东箱壳两类价格偏高,套箱壳价格最低,但整体价格分布较为平均。此外,燃料品种固定,且以烟煤、白煤两类用品价格较高。木炭则长期稳定在低价水平,未有太大波动。

从上述制茶用品的价格趋势中可以看出,制老茶用品的价格在1924—1929年间平稳上涨,1928年以后价格起伏不大。而制红茶用品的价格则呈先升后降的态势,且价格下跌主要集中在1925—1926年。

造成上述制茶用品价格变动的原因:第一,从长期来看,受到物价上涨的因素影响,生产成本的提高是制茶用品价格增长的根本动力。第二,从短期来看,茶叶收购价格变动产生的供需矛盾是导致制茶用品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由于制茶用品与茶叶属于互补商品,所以前者的需求量与后者的价格之间具有反向波动的趋势。沙坪地区1926年的红茶收购价格较1925年增长约20%。因此,该年本地区内茶号的制茶需求量应是普遍减少的。若假定一年内制茶用品的供给量恒定,则产能过剩是价格下跌的重要原因。同理,1928—1929年的老茶收购价格平均降低约4%,由此促使制茶用品的需求量增加,价格上涨。

(二)工资水平

工资问题是物价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工资水平的变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内工人生活水平的状况。在沙坪茶号账簿中记录有1924—1929年间各类制茶工人的工资情况,为探讨本地区的工资水平变动提供了可资量化分析的依据。具体可参见表7和表8。

表7 沙坪地区1924—1929年制老茶工人工资表 (单位:文/工时)

工种	1924	1928	1929
筛拣工(斤)	570	1050	1300
捶炭工	600	1400	1400
捶里茶工	708.5	1580	1660
捶洒二面工	600	1500	1600
挑水工	584	1700	1640
打洒面吊工	500	1300	1300
送撮箕工	560	1360	1360
托扛工	800	1800	1900
搬壳工	880	1860	2000
斤箱押工(股)	10	18	18
东箱押工(股)	9	16	16

资料来源:根据1924—1929年沙坪永玉茶号办茶账簿中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说明:筛拣工薪资以“文/斤”计算,押工薪资以“文/股”计算,其余工种以“文/工时”计算。

表8 沙坪地区1925—1926年制红茶工人工资表 (单位:文/只)

工种	1925	1926
25箱裱油工	260	320
大箱裱油工	360	440
套箱裱油工	70	80
样箱裱油工	36.757	—
25箱做铝桶工	230	310
大箱做铝桶工	260	310

续表8

25箱底纸裱工	—	200
拣茶工(斤)	899.258	972.041
筛茶工(斤)	590	850
起样工(工时)	300	300

资料来源:根据1924—1929年沙坪永玉茶号办茶账簿中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说明:筛拣工薪资以“文/斤”计算,起样工薪资以“文/工时”计算,其余工种以“文/只”计算。

茶区的制茶工人多是来自湘鄂赣交界地带的农民,拣茶工则为临时雇佣的各县妇女。结合表7和表8内容可知,沙坪地区制茶工人的工资支付主要分为:计时、计件、股账分配三种方式。其中,老茶“压砖工”多属于“计时制”,每人每天工作12小时,工期结束后按标准统一发放工资。同时,对于劳动强度大、技术性强的工种,茶号还实行“股账分配制”以鼓励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具体方法是先将人数折为股份,每制成一箱茶砖,每股账便可按比例分红。“筛拣工”的工资以茶叶重量为标准,红茶“箱工”则按照完成箱数领取薪资^①。

制茶工人的工资水平因工作的复杂程度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制老茶工人的工资水平分布较为平均,但因“搬壳工”“托扛工”属于重劳力工作,所以工资水平最高。“里茶”因加工过程复杂,所以工资略高于“洒面”与“二面”。红茶加工过程繁难,虽然不需进行压制,但仍要反复筛分。因此,“筛拣工”的工资水平最高。此外,“箱工”因茶箱种类、体积的不同,工资差异较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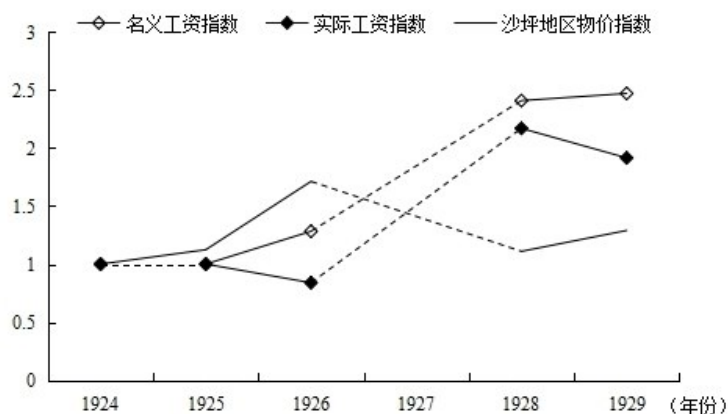


图3 1924—1929年沙坪地区名义工资指数与实际工资指数比较图(1924=1925=1)

资料来源:根据1924—1929年沙坪永玉茶号办茶账簿中相关数据计算整理。

说明:因工种不同,制老茶工人与制红茶工人的工资指数不同。但由于前者缺少1925—1926年的工资数据,遂以制红茶工人的工资指数进行趋势估计。

1924—1929年间制茶工人的名义工资呈上涨趋势。前文已述,1929年沙坪地区的物价指数累计上涨约29%,若不考虑其它人为因素的影响,则生活成本的提高是促使工人工资水平提升的主要原因。但是,表7、表8所示仅是工人的名义工资,无法展现出工资水平受通货膨胀因素影响的实际情况。因此,这里以1924年物价指数为标准,计算出1925—1929年逐年的实际工资。同时,考虑到数据单位的统一,分别选取“计时制”老茶压砖工与“计件制”红茶箱工的工资,并以1924年与1925年为基期,构建名义工资指数与实际工资指数(图3)。

根据图3所示,沙坪地区的名义工资指数与实际工资指数波动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首先,1924—

^① 定光平:《羊楼洞茶区近代乡村工业化与地方社会经济变迁》,第78—80页。

1926年名义工资指数上涨,但显著低于物价指数增速。因此,实际工资指数呈逐渐下降趋势,至1926年达到谷值。可知这段时期内工人的生活成本较高,工资水平相对低下。其次,1926—1928年名义工资指数上涨,物价指数下跌。因此,实际工资指数呈迅速上涨趋势。制茶工人的生活成本降低,工资水平显著提高。最后,1928—1929年名义工资指数继续保持上涨态势,但由于涨幅逐渐趋于边际水平,低于物价指数增速。因此,1929年的实际工资指数下降约25%。考虑到本地区内通货膨胀持续的可能性,制茶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或将继续降低^①。

结 语

物价史研究以翔实可靠的价格数据为基础,注重统计方法与计量分析的结合。民国时期的官方统计资料与社会调查多为前辈学者所运用。但这些材料往往存在地域覆盖面较窄、统计口径与方法不一等问题,致使部分区域的情况无法得以展现。商业账簿作为店号贸易往来的收支记录,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商业经营的具体过程及其发展状况。同时,账簿中还保留着丰富的价格数据,涉及货币兑换、物价及工资水平等重要内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调查材料的地域性问题。

本文所关注的“沙坪永玉茶号”,是1924—1929年间经营于湖北省崇阳县沙坪镇的晋帮商号。其主要负责产区茶叶的收购和加工任务,并经由汉口分号转运至张家口与凌海两处承销市场。通过对茶号账簿中的价格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茶业经营方面,该地区的茶叶贸易属于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从茶树种植、毛茶加工再到茶货贩运,均对海外特别是俄国市场存在较强的依附性。而一旦市场形势发生变化,生产链条中的各个环节都会受到价格风险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茶叶收购价格、制茶用品价格以及制货量的年际波动。在物价方面,货币贬值、自然灾害与战争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该地区存在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物价上涨不仅导致生活成本的提高,也对制茶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造成影响。诚然,作为个案,沙坪茶号的“特殊性”使其无法代表整个羊楼洞茶区的商业经营状况。并且较短的记录时间也难以实现对长期趋势的观察。但是,在资料整体缺乏的情况下,其存在对于鄂南乡村地区物价问题的研究仍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片段”。

近年来,随着契约、账簿等民间文献的大批量涌现,物价史研究已然迈进新的阶段。账簿材料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但是,各地民间文献所使用的度量衡、货币单位以及记录方式差别较大,其地域性问题较官方资料更为明显。因此,加强对账簿等民间文献物价信息的整理和分析,融合不同地区的价格数据,构建统一标准的物价数据库,不仅可以丰富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储备,对于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也将大有裨益^②。

(责任编辑:胡文亮)

① 根据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33年的调查,羊楼洞某茶庄制茶工人工资为每人每天1700文。在晋商的砖茶厂中,以聚兴顺砖茶庄为例,制茶工人工资为每人每天1500~2200文,股账分配每制成茶砖一箱,可分红得钱16文。这些数据与1929年沙坪茶号制茶工人的工资情况基本相同,足见工人的工资水平仍未有太大提升。详情可参见: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湖北羊楼洞老青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第22页。

② 关于利用民间文献构建物价数据库的方法及意义,已有学者做过探讨。详情可参见:蒋勤:《基于石仓文书的清代物价数据库建设》,《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